

论 首 义 精 神

□ 黄春华 王 强(辛亥革命纪念馆 武汉 430060)

摘要:在 20 世纪初叶湖北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首义精神,是武昌首义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首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义精神主要包括了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团体精神和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等内容。

关键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首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3-0041-05

在 20 世纪初叶湖北革命运动中形成的首义精神,是湖北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武昌首义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首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概定的首义精神,是指从湖北革命运动兴起到武昌起义爆发和湖北军政府建立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夕这一全过程中,湖北革命党人形成的思想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它主要包括了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通力协作的团体精神和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

一、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体现了首义精神的显著特点。武昌首义,天下影从,一举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改写了东方和世界历史的进程。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首义”一词遂成为专用名称,专指武昌起义,这个称谓的本身即包含了对武昌起义创新精神的褒扬。

“大体说来,武昌起义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以学术团体为幌子,以新军为主力而发展起来的。”^①在其酝酿、发生、成功的过程中无不充满着创新的精神。在革命发动阶段,湖北革命党人采取投身新军,运动新军,实行“抬营主义”(即成建制地争取新军同情或参加革命)的做法独具特色,并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在对发动起义地点和时间的认识上,同盟会总部不如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又不如湖北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表现出独有的创新精神。虽然孙中山早就开始着眼于全国的全局考虑发难地点,并且武昌这类内地城市也曾进入他的视野,但在实际运作中,他选择的发难地点“始终限于广州一隅”。黄兴也只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怀锥不遇粤途穷”时,才认识到“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的。然而,在 1910 年至 1911 年间,湖北革命党人却是极力主张在武昌发动起义的。1910 年 11 月,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开会商讨回国起兵的地点,大多数人主张在西南边省,唯有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力持非武昌不可”。1911 年春天,谭人凤奉黄兴

之命到武昌,他此行的目的本是策划湖北党人响应广州起义,但湖北党人孙武等并不赞同他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反而向他力陈在武昌起义的便利,最终使谭人凤“心悦诚服”,并留赠活动经费。熊秉坤在 10 月 10 日晚起义的前一刻更是坚信:“天下形势,要算湖北,自海通以来,经济、文化、交通、人材均集中武汉,湖北一起义,天下风从,乌得不成功乎。”^②适时把握有利时机,突破固有思维定式,是武昌起义胜利的重要原因。虽然同盟会领导人曾对武昌发难做过相应的部署,但却认为“各省机关,还没有一气打通,湖北一省,恐难做到。必须迟至九月初,约通十一省同时起事才好”^③。并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待筹款到后再行起事。但面对大批新军骨干调防外地,主要领导人或捕或逃的严峻局势,湖北革命党人没有墨守成规、坐以待毙,而是果断决定立即起义,一举占领武昌。设使湖北革命党人面对急剧变化了的局势,不能发挥自身的创新潜能,而是消极地等待“外款接济”或是同盟会的统一号令,岂能有为天下先的武昌起义的胜利?

创新精神在湖北军政府的政权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0 月 11 日,已占领武昌全城的革命党人齐集清湖北谘议局,商组革命政权。革命党人与谘议局成员商定:“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四、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五、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六、当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④虽然同盟会对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模式有过基本设想,但首先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完全实践这个模式的却是湖北革命党人。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脱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拓荒意义无须赘述,即使是后人多有微言的与谘议局立宪党人合组政府,以旧军官出任军政府都督的做法,在随后各省的独立运动中也得到程度不一的仿效。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中就曾指出:“各省先后起义,大抵皆发动于谘议局与新军,而领导新军者多有高级官长,此

其原因,则以武昌首义,推举协统黎元洪为都督,而谘议局首先通电各省,促其响应。”客观地说,这些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体现了一种创新精神。武昌起义事起仓猝,直接发动者都是新军中的下级官兵,预先推选的湖北革命领导人都不在现场(即使在场,他们的社会声望也无法与黎元洪、汤化龙等人相提并论),全国性的革命领导人更是远在海外,全然不知武昌已爆发起义。现场的革命党人既没有黎元洪那样在军队中的声望,又缺乏立宪党人的政治经验,与旧军官的联合成为扩大起义影响最切实的选择。而且,在这种合作的初期,革命党人是牢固地掌握着军政府的实际权力的,《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的出笼即是证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应当成为否定湖北革命党人创新精神的口实。由首义同志集议,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对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设作出了详尽的规划,成为后来代表南京临时政府主要成果的《临时约法》的蓝本,在中国近代共和政治史上影响深远。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湖北革命党人在军政府的外交建设上审时度势,掌握主动,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强的政治远见和创新精神。为了向列强各国申述革命宗旨,表白外交政策,扩大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影响,湖北军政府向驻汉英俄日德法五国领事发布了一系列外交照会,最终赢得了列强各国严守中立、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的外交成果。这个外交成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解除了列强公开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后患,另一方面割断了列强对清政府的外援,孤立了清王朝,有利于革命党人集中力量巩固首义成果。应当指出的是,列强各国在当时是具备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实力并存在武装干涉的可能性的。武昌起义后英、德、日、俄、法、奥各国驻远东的舰队陆续驶入长江和进泊中国沿海,到10月22日,集中在汉口江面上的外国军舰已达20艘,其中英国8艘、德国5艘、美国3艘、日本2艘、俄国和奥地利各1艘^⑤。此外,“鄂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领张彪、水师统领陈得龙等率残部在刘家庙顽抗,亦派员与领事团交涉,要求外舰炮击武昌”^⑥。湖北军政府如果不能争取到列强的中立,将会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与列强公开对抗,无异是以卵击石,使列强倒向清王朝一边,革命胜利的把握也将大打折扣。与列强各国外交关系处置的不当,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就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由广西打过湖南,以至建都南京,而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于外交的失败”^⑦。湖北革命党人灵活机动,讲求实效,以我为主的外交政策,避免了列强各国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面,使武昌首义点燃的反清烈焰得以迅速燃遍中华大地,这不失为一个创举。即使是后来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也未有出其右者。

二、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宣传组织工作,为武昌起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思想和组织基础。“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在他们当中并未产生过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脚踏

实地、埋头苦干,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湖北革命党人长期隐身下层群众之中,洗尽铅华。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由上海到武汉时,见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如田舍翁,党人李长龄若老学究,都是土头土脑的,颇有轻视之意。党人胡瑛一语中的,“湖北革命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指文学社)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才使谭人凤消除了疑虑。正是这些土头土脑的湖北党人筚路蓝缕,孜孜奋斗,成就了武昌首义的伟大勋业。

湖北革命党人的实干精神在革命的组织和发展阶段体现得最为充分,在发动新军和进行革命宣传方面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

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发展历程,最先印证了这种实干精神。革命党人在“知清政府之不可与图强”之后,“遂决然改易其希望清政府立宪之主旨,一变而为民族民权革命之进行”,筹创革命团体。先是组建活版印刷所,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书籍进行革命宣传,待筹措到开办经费后,即租屋创办科学补习所。在得知湖南有革命组织华兴会时,即派人前往联络,约定在湘鄂两地同时起事,并制订了在鄂省起义的详细计划,后因华兴会事败而遭当局查封^⑧。此后的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革命团体,其名称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使然,更是湖北革命党人实干精神的体现。

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目标。早在科学补习所时,就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注重身体力行,“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⑨。刘静庵、张难先等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入马队营、工程营当兵。湖北革命实录馆收到的大量传记资料中,都有厕身行伍以行革命的记载。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社,正是在党人总结了历次起事“俱由联络多非军人,骤尔举事,无枪械弹药,复无所谓编制,无所谓统率,遂致一经军队弹压,而无待杀伐,即东奔西走,覆水一盆”^⑩的教训,而在新军中成立的革命组织。熊秉坤在旧历辛亥六月与党人杨玉如的对话,集中反映了湖北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发动革命的一贯主张。“杨:鄂中革党,军界有人,会党有人,此次起事,果以何界为利?坤:以军界为利。杨:何故?坤:势力最大莫如军界。军界动,则无人反对。无人反对,则事易举。况军界之中,器械足用,军人亦奔走灵活,能耐劳苦,大事岂有不成乎?若以学界、会党发难,一旦军界不应,或作反敌之行,则其势为瓦解必矣”^⑪。湖北革命党人为发动新军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党人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策动革命被开除后,又到武昌入陆军41标3营为兵,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苦的行伍生活,以运动新军为目的。留日学生《商务报》总编刘复基为运动新军,甘心入伍当副兵,他的身体本来难以坚持卒伍生活,但他“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⑫。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不满足于在海外的宣传工作,毅然带病回鄂,致力于湖北各革命团体的团结,尤其注重发动

新军,直至病重身故。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到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文学社和共进会会员迅速发展到5千多人,再加上其他同情革命的士兵,革命力量已在湖北新军中占有明显优势。这个骄人的成绩,正是对湖北革命党人实干精神的最好回报。

湖北革命党人的实干精神还在其深入扎实的舆论宣传中得到体现。他们的宣传重点是革命排满。从一开始就注意把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结合起来,除秘密翻印、散发革命书籍外,还利用某些合法的形式宣传革命。日知会就利用教会阅览室,陈设进步书刊,每逢星期日演讲爱国救亡道理,听众有时多至千余人,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还掌握了几份报纸作为宣传喉舌,文学社的《大江报》最为有名。它成为新军士兵的代言人,“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除向新军各营队免费赠阅外,《大江报》还注意培养和壮大宣传力量,“凡军队中之社员,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借以训练社员之胆识,而取得其同情,兼以坚其志”^⑦。《大江报》本是进步知识分子詹大悲于1911年在汉口创办的,詹大悲加入文学社后,《大江报》也成为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后来虽被查封,但它为武昌起义作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革命党人注重结合身边实际做好宣传工作。文学社宣传反清革命,从“本镇各标营旗籍官兵,均系双粮双饷;其他一切享受,均在汉人以上”讲起,然后再引申到“种族革命”、“救国救民”,最能打动士兵。湖北革命党人还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配合正面宣传,比如放映幻灯、编制歌曲、吟诗联句、讲故事、做游戏、在军营附近开设酒楼,于饮酒吃饭之际,借机传播革命道理等等,在激发民族情绪,宣传革命排满方面收到了很好的实效。武昌起义中孕育而生的湖北军政府,同样踏实深入地进行了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舆论宣传,卓有成效地扩大了武昌起义的影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三、振兴乡邦的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是人们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本民族最崇高的感情,是一个民族最强大的凝聚力,也是个人道德情操的最高体现和推动进步的重要力量。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湖北革命运动的始终,是武昌首义的原动力,也是首义精神最重要的内容。首义精神中的爱国内涵主要是以振兴乡邦和革命排满的愿望表现的。

振兴乡邦是湖北革命党人的一贯愿望,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最朴素、最直观的体现。《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缘起》明确指出:“爱国必自爱乡始”。这个《缘起》进一步说,留日湖北学生,“痛外患之日亟,而(中国)内部腐败之情形又不堪设想”,于1903年创立同乡会,以专门之学、自治之义相砥砺。“自今以后,留学者既有输入文明之责,回国者亦有革除陋习之任。果能力求进步,使吾楚终有自立之一日者,未始非区区之同乡会为之起点也”^⑧。爱国爱乡之情

浸润于字里行间。在争取粤汉、川汉两路废约自办的斗争中,湖北留日学生爱国爱乡的热情更是溢于言表,他们认为:“吾鄂待修之粤汉、川汉两大铁道,贯国中枢。以地大物博之中国,水陆总会于汉口;铁道一成,伦敦、纽约将来殆亦难方其繁荣。故此路成否,影响于吾国者甚巨,吾鄂尤巨。”^⑨“湖北人办则湖北人存,湖北人不办则湖北人亡”^⑩。“鄂省人民一闻外债,几乎谈虎色变,矧损失主权如是之甚耶”^⑪。“使二路者悉归自办而成功,吾湖北乃坐享其利”^⑫。成立于武昌起义之后的湖北革命实录馆,自1912年6月至1913年8月共收集到集体和个人所撰有关武昌起义的史料五百余件。这些史料的开篇,在述及革命动因时无一例外地体现了爱国爱乡的精神,其中“雪东方病夫之奇辱,洗老大帝国之污名”^⑬、“恢复二百年之祖国,除去数千载之专制”^⑭之类的表述俯拾皆是。无名氏在述及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的历史时说,“先是,鄂中志士自癸卯夏四月抵制俄约之后,始知清政府之不可与图强也。适留东志士提倡种族革命,潮流所及,影响及鄂。诸志士乃遂决然改易其希望清政府立宪之主旨,一变而为民族民权革命之进行”^⑮。党人汤启发在其自传中记述:“武昌为湖北省会,文明肇造,风气先开,加以张香涛先生建学堂,增军队,提倡有年,而智慧日广发达。启发生于斯,长于斯,耳目濡染于斯。忿汉族凌夷,恨满清横恣,颇有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伪清光绪二十四年入工程八营,充当兵士。”^⑯党人汪长林“经商汉上,历有年矣。昔日与通达君子交游,始知汉室陵夷,满清横恣,颇深时局之感。故改图从戎,研究军学,联结团体,以期逞于满”^⑰。

“革命排满”是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也是湖北革命党人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形式。湖北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成立开始,即以“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⑱。以后日知会、群治学社、文学社都没有另外制订什么新的纲领,仍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即使是为了防止破坏,表面上以研究学术、提倡自治为宗旨的群治学社,在其宣言中仍不忘“我中国……积弱无能,任人欺侮,台湾朝鲜相继沉沦……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⑲。自认为是同盟会外围组织的共进会,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中的最后一句改为“平均人权”用作自己的纲领。在其成立的宣言中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⑳由于自身的局限,湖北革命党人只是接受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二民主义”,在民族和民权两大主义的宣传方面“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只知反清革命而已”^㉑。有清一代,“反清”一直是会党和其他下层群众一面传统的斗争旗帜,湖北革命党人将其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即将反清与救亡图存和建立共和政体联系起来。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在其传记中记载,起义前夕他曾致书孙武,认为:“巍巍大国,将化为欧美之领土。黄族子孙,将变为白人之奴隶。而今政府犹如睡狮、梦汉,竟不觉悟。政治不变,国体不固,徒知谄媚以事上,专制以驭下,为保守一己之禄位计而已。他若国家之若何,保存生灵之

若何,过度弗问矣。”“吾鄂同人若不乘此机宜,攘臂呼起……恢复两百年之祖国,除去数千载之专制,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国体之中,脱离于奴隶圈围之外……与欧美并驾齐驱。”^②党人金兆龙在追述其革命历史时也说,青少年时代往来汉上经商,与人谈论时局,每每感慨欷歔,声泪俱下,“客慰之曰:‘黄帝子孙,受制满奴,已二百余年。大丈夫当力图恢复,光大汉族,复齐襄九世仇,勿徒效新亭故事。’龙遂决心投身军界,联络同胞,以俟民智大开,而问满清之鼎”^③。“革命排满”思想明白无遗。应当指出的是,“革命排满”的主要含义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实行民主共和和民族平等,而不是消灭满民族。湖北军政府就曾初步提出了联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对满清封建统治的思想,指出:“凡文明之族,降在水火,皆为我同胞之所必怜而救之者。”军政府还多次发布命令,禁止乱杀旗人,保护教民。“革命排满”体现了湖北革命党人的爱国精神。

四、通力协作的团体精神

有意识的团结协作是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所谓团体即是由多数人结合的集体。团体精神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等实践活动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人心齐,泰山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政治革命中尤其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愈来愈重要的趋势。革命力量的团结和联合,是武昌起义胜利的重要原因。

湖北革命运动自发初之日起,就以革命团体聚合革命力量,科学补习所、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莫不如是。如果说文学社从群治学社时代开始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团结对象的话,成立于东京,1909年由孙武等人开始在湖北活动的共进会,则表现了更为广泛的协作意愿。共进会在其成立宣言中说:“我们这个会,为什么叫共进会?——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单就我们这个团体说,就是在会的人,个个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一个事业,不可一人别怀他样的异心;就本会以外说,凡是我们的,不论他叫什么会名,我们总要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团体,共同去做事业。所以这共字就是和我们全中国各种会一同去做的意思。”^④“我所以要劝告我们同胞同党,不可分门别户。须要晓得我们是汉人,同是轩辕子孙,全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象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才要这共进二字,增进我们兄弟知识,共拚死力,有进无退的去杀满人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才算是英雄。”^⑤虽然这个纲领是共进会总会在东京成立时发布的,它考虑到了当时革命党人来自全国各省的地域因素,但它在湖北的分支机构的确是很好地贯彻了这个思路,其会员成份包括新军士兵、会党分子和其它社会成员,显然要比文学社广泛得多。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集中体现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本来,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人大多是归国的留学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历是不尽相同的,两个团体起初在新军中的力量也是有差别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有着共同政治目标的两个革命团体,基于“合则力量聚而大,分

则力量散而小”的认识开始了联合。两大革命团体为了实现联合先后召开了五次次会议。1911年6月14日,在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均表示了合作意愿。共进会代表杨玉如、李作栋发言说:“我们两个团体本来是异途同归,现在正是要同归的时候,不能再异途了,只要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合作,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文学社代表刘复基、王守愚也认为:“我们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满人为革命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都能和衷共济,就能达到目的,而且我们个人并不争权利和地位,只要目标既归一致,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呢?”^⑥双方达成了在新军中不互争党员的协议。9月14日,双方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举行第三次会议,达成了取消文学社、共进会名义,邀中部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的共识。在这次会议上,孙武首先肯定了革命发动所取得的既有成绩是文学社、共进会“和衷共济”的结果。刘复基建议,“现在我们到了与清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王朝拚个死活”。刘公在发言中强调,“不但是团体界限化除,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负责名义,也是过时无效的东西,重新改造”。自愿放弃在东京共进会时被预推的湖北都督称号。蒋翊武、王宪章也先后发言,同意取消团体界线并自愿即刻取消文学社正副社长名义,以党人资格与大家共谋革命事业^⑦。9月23日,革命党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宅又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本着平等协商,互相尊重的原则研究了领导人选问题,初步拟定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管军令;孙武为军务部长,管军政;刘公为总理,管民事。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胡祖舜家召开了联合大会,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实现了湖北两大革命团体的正式联合。这次会议确定了起义的大体日期及起义后军政府的领导机构,更重要的是制订了具体的起义计划,完成了武昌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爬梳两大革命团体联合的全过程,人们不难看出湖北革命党人不计名利、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革命党人的精诚团结保证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五、不计生死的牺牲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为了实现推翻满清王朝建设共和国的革命目的,湖北革命党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鄂人不计死生……人人置生死于度外”^⑧。洒尽无量英雄血,一时多少豪杰。

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是湖北党人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第一人。1905年2月,他在河南彰德(今安阳)行刺清户部侍郎铁良,惜连发三弹均未命中,在清兵的追捕下,他先是自戕未遂,继而投水井殉难^⑨。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以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被称为“革命完人”。1907年1月,日知会响应萍浏醴起义事败,刘静庵因被叛徒诬告为湖北全省会首刘家运而被捕。清吏诱降不成后,使用酷刑。刘静庵受鞭刑1400余下,肉尽见骨,晕死数次,但他仍铁骨铮铮,宁死不屈,被时人称为“铁汉”。1911年6月,终因狱吏摧残,

病死狱中。刘静庵终身未娶,死时年仅36岁,须发尽白,骨瘦如柴,以至老母收殓时,竟不敢相认^⑥。1911年10月10日彭刘杨三位烈士的慷慨就义,集中显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10月9日夜,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相继被捕,清湖广总督瑞澂立即组织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彭刘杨三烈士以他们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会审时,铁忠见彭楚藩着宪兵服,是其妹夫的下属,为摆脱干系,有意为彭开脱,他递话给彭楚藩:“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彭楚藩并不理会铁忠的暗示,慷慨陈词:“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含笑赴死。刘复基一进公审会堂即高声叫喊:“要杀便杀,何必多问。”判斩刑后,刘复基高呼:“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杨继胜怒吼:“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为纪念他们的牺牲精神,革命党人胡石庵赋诗赞曰:“貌清而洁,骨侠而烈,促革命之动机,贡牺牲于祖国。”“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

在武昌首义和阳夏战争的军事行动中,更是处处体现了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辛亥八月十九夜革命军在武昌之倡义,人数可谓极少,自天黑至天明占领督署时,合计步兵工辎测绘各同志不过二千余人”^⑦,革命党人在一夜之间占领督署,光复省城,取得辉煌的军事奇迹。除开众多客观原因,他们的牺牲精神是克敌制胜的关键因素。工八营党人程凤林在起义中被同志误伤,后因伤致死。死前,他对同人说:“我死不足为惜,只要民国造成,我死强生,正所谓死得其所,乃丈夫一快事”^⑧。为保卫首义成果,给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争取主动,首义军民在汉口、汉阳与清军展开了历时月余的惨烈鏖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无数烈士“横卧沙场,惨不忍睹”^⑨。汉口争夺战中,民军伤亡达六、七千人之多。散见于张难先《湖北革命知录》中的具体记载有:10月16日,刘家庙伤亡三百余人;10月17日,三道桥伤亡四十余人;10月20日,漉口阵亡官兵二百余人,伤七十余人;10月26日,阵亡官兵一千六百余人,伤五百余人;10月28、29两日,伤亡二千余人;10月30日以后仍有零星伤亡^⑩。武昌首义中率先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的工八营党人马融,在汉口争夺战中任五旅九标三营管带,战斗中他左臂受伤,“致使敌人擒去,劝其招降,骂骂不屈而凌刚死矣”^⑪。汉阳保卫战中阵亡军官一百三十七人,伤八十五人,士兵阵亡二千六百九十三人,共计伤亡三千三百余人^⑫。单是11月16日反攻汉口之役,即“死伤军官五十七人,士兵七百九十二人”^⑬。武汉市民也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投身于保卫首义成果的革命战争。汉口争夺战中,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为民军输送军粮及犒劳物品,劝说清军反正,向民军慷慨捐赠,拆毁铁路,破坏清军交通。汉阳失守后,竟有“十岁、十一岁儿童胡小海、毛小生负枪同来,甘愿投效,以杀敌人”^⑭。市民同样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在清军炮火的攻击下,平民大量伤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

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籍”^⑮。清军为夺回汉口,纵火焚烧街市,中国内陆最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变成一片瓦砾,损失无以数计。1912年孙中山先生访鄂时还专程前往凭吊,并极力筹划重建。首义军民的巨大牺牲,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⑯。共和民国的旗帜上,浸染了首义军民的热血;共和民国的天空中,激荡着首义军民的牺牲精神。

与物质财富一样,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同样是馈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首义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遗产。借鉴、继承和弘扬前人的精神遗产,并把它与人们所处的时代有机结合起来,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江汉汤汤,这似水流年,常记起八月十九;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这是1912年10月,革命党人黄兴为讴歌首义功勋而作的贺联。在他的联中,首义功勋是不朽的。其实,同样不朽的还有首义精神。

注释:

①⑥⑨⑫⑮⑯⑰⑱《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第1版,第305、312、307、500、499、501、515、517页。

②《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40页。

③ 龚霞初:《武昌两日记》,《辛亥革命》(五),第44页。

④⑦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影印本,第38、31页。

⑤《辛亥革命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34页。

⑦《总理全集》第2集,第286页。

⑧⑩⑭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24、3页。

⑨⑫⑬⑭⑯⑰ 冯天瑜:《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111、115、293、309、301页。

⑪⑫⑬⑭⑯⑰⑱《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4、103、88、5、69、53、52页。

⑬⑭⑰《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04、698、699页。

⑭⑮⑯⑰⑱《辛亥革命在湖北资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457、451、454、450页。

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177页。

⑱《湖北文史资料》第17辑,第94页。

⑲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⑳ 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6页。

㉑《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㉒《民主报》1911年12月1日。

㉓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43页。

(责任编辑 黄长义)